

# 毛主席语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 目 录

- 十六个青年店员的反腐蚀斗争  
——上海市中南中心合作食堂的调查报告  
..... ( 1 )
- 防微杜渐  
——记西铺大队干部坚持继续革命的事迹  
..... ( 5 )
- 万里征途不歇脚  
——记红军老战士、共产党员甘祖昌  
..... ( 13 )
- 反修防修的坚强战士  
——记红军团长方和明同志继续革命的事迹  
..... ( 23 )
- 赤脚书记廖锡龙  
..... ( 32 )
- “老盛掌印把子，我们放心！”  
——记受群众拥护的好干部盛建中  
..... ( 38 )

“革命老黄牛”

——记吴发琴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  
革命的事迹

..... ( 46 )

做清除旧社会痕迹的战士

——记清洁工黄裕琼、汪桃珍同志的先进事迹

..... ( 54 )

勇当破除旧观念的尖兵

——记复员军人魏尧升退伍不回上海、立志  
务农的事迹

..... ( 60 )

一桩婚事的报告

——记优秀共青团员丁玉芹同特等残废军人  
陈忠江结婚的故事

..... ( 69 )

# 十六个青年店员的反腐蚀斗争

——上海市中南中心合作食堂的调查报告

上海市黄浦区第一饮食公司中南中心合作食堂，是个集体所有制单位，下属六家食堂，共有三百四十五人，其中二百一十五人是由摊贩和小业主转来的。解放以来，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政治思想觉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在一部分人的身上，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残余仍很严重。一九七〇年，这个单位分配进来十六个青年。四年多来，这些青年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对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这些青年进店后，为了增强他们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免疫能力，这个单位的党支部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青年学习马列小组，坚持每星期学习两次。几年来，他们读完了《国家与革命》、《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在学习中紧密联系本单位的实际，分清是非，抵制歪风邪气。这个食堂中心店设在热闹的延安路上，对面就是电影院和理发店。有些人就对新来的青年说：“理发店店员理发不花钱，电影院职工看电影不花钱，干我们这个行业揩点油也理所当然。”店员中有些原来是摊贩、小业主的人，还常常用多吃多占的手法拉拢青年，但都遭到了青年们的抵制。

食堂有个女青年，有一次在店里买二两面，有个小业主家属却故意给了她三两。她吃完面后就到柜台上再补买了一两面的筹子，并当面向这个小业主家属指出：“你这样做，是什么用意？”另一个青年有一次在店里买了一碗馄饨，打开锅子一看，足足有两碗。他立即向领导反映了这一情况，并和领导一起当面责问那个下馄饨的人：“为什么买一碗给两碗？”那人听了这话很尴尬，不得不承认这是腐蚀青年的行为。还有一个青年，有一次在店里买豆浆，不小心打翻了。有一位老店员立即说：“不要紧，再拿一碗去。”说着，就给她重新打了一碗。她想，三分钱的豆浆是小事，可是沾染了多吃多占的坏思想却是大事，立即去卖筹处又买了一个筹子补送去。有个小业主是专门做薄饼和卖豆浆的，自己吃或者家里的人来买，就专门做，油水、作料、重量都同一般的不一样。他害怕别人批评，总是千方百计地想给别人一点“好处”。正如列宁说的：“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青年们每天在店里吃饭的时候，一些小业主给青年吃的面条油水重一点，豆浆浓一点，甚至连油条炸的时间也要长一点，真是花样百出，防不胜防。十六个青年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决定不吃自己食堂里的点心，每天从自己家里带饭用开水泡着吃，四年多来一直坚持到现在。青年们这种拒腐蚀，永不沾的作风，曾受到各种讽刺打击。有的说这些青年是“憋大”；有的说他们是为了“往上爬，想当官”；有的还讽刺他们说：“真节约啊，要发大财了”。讽刺也好，打击也好，这些青年都顶了下来。他们说：“多吃多占是私有制的产物，我们就是要

同它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不然，共产主义理想怎么能实现呢？”

这些青年还十分注意同资本主义的经营路线作斗争。有一次，中南食堂有六斤肉酱变了质。食堂负责人为了追求利润，就叫一位青年放到油锅里炸一下再卖出去。这个青年想，社会主义企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了多赚几个钱，如果把变了质的东西卖出去，就会损害人民的身体健康，这是决不允许的。他就向这个负责人指出，这是欺骗顾客，坚决不干。另一位青年又立即向党支部作了汇报，并写了一篇小评论，批判这种资本主义的经营作风。还有一次，食堂里白鱼太多，售不出去，食堂负责人就把水牌上写着的“白鱼”改成“花鲢鱼”。他们发现这件事后，立即对食堂负责人指出这是旧社会的“生意经”，并在食堂内部贴出了一张《白鱼为什么会变成花鲢鱼？》的大字报，制止了这种歪风的发展和蔓延。

最近，中南中心合作食堂又分配进来一批青年。原来十六个青年中的好思想好作风，也给这批青年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有一次上早市，新进来的一位青年喉咙痛，要喝点盐开水，有人就讲：“这里有的是盐，喝杯盐开水没有关系。”一九七〇年进店的一位青年在旁边听见了，就耐心地对这个青年说：“店里的盐是很多，但它是集体的财产，现在先喝一杯，等马路对面卖盐的店门开了，买了马上来还。”这位青年等八点钟盐店的门一开，就买了一小包盐送回店里。青年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在谈到辽西战役中战士遵守纪律、不吃群众一个苹果的革命精神时说：“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

**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青年们高兴地说，食堂里的盐很多，不吃是很高尚的，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盐。

十六个青年为什么能长期地在小生产者的包围之中，不受腐蚀和坚持斗争呢？最近，这个单位的党支部和大家一起议论了这个问题，一致认为最根本的一条，是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加强思想教育。这些青年刚进食堂时，就赶上了“一打三反”运动，受到了一次阶级斗争的锻炼和教育。有的青年说：“我参加了‘一打三反’运动，发现有些犯错误的人，往往是从多吃半碗馄饨开始的。因此，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也应当从小地方开始。”有的说：“我参加了这场斗争，受教育很大，使我看到了对资产阶级的腐蚀不抵制、不斗争，就会有被拉下水的危险。”

现在，十六名青年中已有两名在反资产阶级腐蚀的斗争中入了党，六名青年入了团，其中九名青年已分别担任了各种领导职务。这些青年和广大中、老年职工团结在一起，沿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不断前进，一代新人正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激烈斗争中茁壮成长，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正在这种斗争中向前发展。

上海市黄浦区第一饮食公司调查组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

# 防 微 杜 渐

——记西铺大队干部坚持继续革命的事迹

二十年前，河北省遵化县的王国藩带领二十三户贫农创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只有三条驴腿，一张破犁，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在一片荒山坡地上艰苦创业的精神，曾经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被伟大领袖毛主席誉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二十年来，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王国藩所在的建明公社西铺大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的三条驴腿被拖拉机和成群的骡马代替了；荒山坡地上，栽满了松柏和果树；原来那些瘠薄的土地，变成每亩能打千斤粮的大寨田了。但是，在发生着的历史巨变中，这个大队的干部不仅保持着当年办社时那股“穷棒子”精神，而且把那种热爱集体、廉洁奉公、拒腐蚀永不沾的革命传统，更加发扬光大了。

## “不变，就要弄清为啥会变”

如今，来西铺参观的人们，经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西铺大队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而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在干部们身上却一直不变？对于这个问题，西铺大队干部们的回答是：“不变，就要弄清为啥会变。”

西铺大队走上集体化道路以后，经历过多次的政治斗

争，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党支部的成员和干部们逐步养成了一种联系实际，读书学习，分析总结的新习惯、新风气，从而使他们找到了掌握真理、弄清事物本质的一把钥匙。

西铺大队的干部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曾经结合学习《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多次对自己身上存在的弱点、缺点进行剖析，摸到了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在当年带头办社的二十三户贫农中，有一个叫戴存的孤儿。解放前，他家被地主剥削得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泪半碗，糠半碗”。土地改革以后，戴存分得了地，有了房，但不久父母去世了，刚满十三岁的戴存因无力耕种，只得把分到手的三间房和十亩地重新典当出去，社会上两极分化的旋涡又把他吞噬得一无所有。毛主席及时指明走集体化的道路，又一次拯救了戴存。他加入了“穷棒子社”。后来，集体经济发展了，戴存的生活富裕了，而且当了干部，有人就对他说，这回你当了官，苦苗苗成了“福苗苗”，“穷棒子”该变“富棒子”了。这话他听得进，不久就动用队上的大车、拖拉机，从集体的采石场拉石头，叫社员给他垒猪圈。缺口一打开，处处搞特殊，公私就不分起来，路子就慢慢地走歪了。

过去，戴存在大队党支部的帮助下，对走过的路也做了检查，但他总强调自己出身苦、根子正，把犯错误仅仅说成是受坏人挑唆，一时受骗上当。阶级敌人挑唆固然是个重要原因，但总归是个外因。大家总觉得他没有挖到根上。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戴存和同志们一起学习了《国家与革命》。

他对照着革命导师列宁的光辉论述，回顾自己的历史和思想演变过程，终于悟出了道理。他说：合作化前，我两次被剥削得一无所有，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走上集体化道路之后，生产资料由私有制变成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但因为我在思想上还没有同私有制实行彻底决裂，小生产固有的习惯还没有得到根本改造，站在集体田里，拿着集体农具，心总想着个人，忘记了在私有制下遭受的苦难。这是我为什么要变的根本原因。“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讲的是多么深刻，可千万不能忘记！

戴存思想上的飞跃，对西铺大队的干部启示很深。大队党支部发动大家顺藤摸瓜，结合理论学习，继续深挖细找可能引起思想演变的各方面因素，进一步提高了大家努力学习革命理论，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党支部副书记王荣，是当年“穷棒子社”二十三户老贫农之一，社员们称他是“集体的顶梁柱”。全队大人小孩都很尊重他，不少人称呼他“王书记”。喊的人也许无意，但王荣却犯了思索：人家管我叫“王书记”，我身上是不是有“书记”架子？他从总结自己的工作入手，认真地查找原因。别人劝他对这类事情不必那样计较。他说：“我们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如果这个位置颠倒了，我们就会变修，这可是个大问题。”象王荣这样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改造世界观，在西铺大队干部中形成了风气。

### “防风，就得先堵洞”

这是西铺大队的干部拒腐蚀防演变的一条重要经验。他

们说：资本主义势力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无时不有、无孔不入的。我们防修反修，抵制资产阶级的腐蚀，既要大搞群众运动，无情地涤荡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又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从点滴做起，防微杜渐，在阶级斗争中打主动仗。

王国藩担任县委书记以后，继续兼任西铺大队党支部书记。他除了在县委机关领取一些生活补贴费以外，坚持在大队按同等劳动力记工分，参加分配。王国藩家里人口多劳动力少，老伴和儿媳常年有病，家庭生活不宽裕，他就发动全家老小打草养猪，自力更生，不超支借用集体的公款。在县里工作时，他同干部和职工在大食堂一起吃饭，下乡时在社员家里吃饭，从不搞特殊。他经常对干部说：“请客送礼，谋求特权，贪图享受等等不正之风，是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革命队伍的一种手段。《红灯记》里的李玉和为人类求解放，四海为家，穷苦生活几十年，只有一盏红灯留给了李铁梅，让她继续革命。我们要以李玉和为榜样，同资产阶级的‘酒席筵’作无情的斗争。”

有一天，西铺大队有个家伙因为干了不少坏事，害怕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惩处他，让他小舅给王国藩家送来一份“礼物”。王国藩知道后，立刻从家把“礼物”带到党支部大会上，对大家说：“这就是糖衣炮弹！我们要把这些糖弹变成回击敌人的炮弹，把‘礼物’变成廉洁奉公的教材。”王国藩的行动，对大家的教育很深。从此，西铺大队党支部把党员干部不准“吃请”、不能受贿、不徇私情、不搞特殊，坚决按照党的原则办事，作为一条纪律规定下来。党支部还每隔一段时间，在党内开展一次反腐败防演变的斗争。在党员

干部中出现了许多带头“防风堵洞”、廉洁奉公的动人事迹。

党支部副书记王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一位青年干部。在一次推坡造地的战斗中，他吃在工地，睡在工地，腿上生了疮，脓血顺裤腿流到鞋袜上，一声不吭，仍然带头苦干。不久，他病倒了。人们知道他胃口不好，病又很重，分粮时，就多分给他家几十斤好粮食。他知道了，就对爱人说：“咱干部是社员的代表，哪儿也不比社员高，为什么要多吃好粮食？”爱人说：“你有病，为什么就不能‘吃照顾’？”王顺说：“今天为这个照顾，明天为那个照顾，照顾来，照顾去，就变成了特殊。针尖大的洞，会钻出斗大的风。这个口子不能开，社员吃啥咱吃啥。”他说服爱人把粮食送还队上。

党支部委员王凤祥，是个年过半百的老党员。他担任大队拖拉机站队长后，眼前摆着上百台（件）现代化农业机具，但是他眼睛盯着的、手里拣着的却尽是些破铜烂铁。有一天，他发现有的机手把擦机器的油污棉丝，用完扔掉了。他想：扔掉的一缕棉丝不值几个钱，但这股大手大脚的风必须堵住。他把机手扔掉的棉丝拣起来，放在一起，几天就积攒了一大堆。然后，他把机手召集在一起，指着那包棉丝说：“一缕棉丝辨心思，是为集体想得多，还是想得少？你们扔掉的不是棉丝，是我们的传家宝——‘穷棒子’精神！”老队长一席话，使机手们受到教育。几年来，西铺大队的机手们从不“拉私”贩运，从不“吃请”受贿，处处从勤俭着手，严格要求，为集体多出力，受到广大群众赞扬。

西铺大队的干部在拒腐蚀防演变斗争实践中还有一条深刻体会，就是要把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同在党内开展积极的思

想斗争结合起来，自觉抵制资产阶级腐蚀同发动群众开展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在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几年来，这个大队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常年不停，政治夜校越办越好，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不断扩大，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发展。如今在西铺，人们不讲“中庸”讲斗争，“好人主义”被说成是“坏人主义”；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被批得臭不可闻。广大群众学理论、学政治、管方向、管路线。一心为公、热爱集体的“社员干部”大批涌现。西铺大队的干部高兴地说：“觉悟了的群众才是真正的反修防修的‘铜墙铁壁’。”

### “身不离庄稼地，心不离庄稼人”

这一条是西铺大队的干部多年坚持下来的老传统。它既被这个大队干部看成拒腐蚀防演变的一项根本措施，也被这个大队的社员作为推选和检验干部的一把尺子。

早在二十三户贫农办社时，王国藩和“穷棒子社”的干部们，就曾以和群众一起摸爬滚打、艰苦创业闻名。那时候，他们肩搭一条麻绳，腰别一把镰刀，带头拉犁耕种，上山打柴，早晨群众踩着他们的脚印下地，晚上他们踩着群众的脚印回村。他们被称为“穷棒子社”的“铁棒子”，贫下中农的“主心骨”。如今，群众又亲切地称呼他们“社员干部”了。

西铺大队的干部外出开会、接待参观者的时间花得多，而他们每人每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都在三百天以上。党支部书记王国藩到县上工作后，每天要考虑的问题多了，要管的事也多了，但是他仍然定期回西铺大队，和社员一起搬石垒

坝，推土垫地，坚持参加劳动。有人对他说：“你是县委书记，论职务也算个国家脱产干部，回来几天，帮大家出出点子，不必再到地里干活。”王国藩回答说：“国家的脱产干部，决不能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群众。”党支部副书记王顺，主持大队的全面工作，事情多，他参加劳动也多。有一次，他到省里开会，回到遵化县城是个晚上，向县委汇报完开会情况，已经夜深了。同行的人劝他明天坐班车回大队。他说，要坐班车就不能参加明天上午的劳动了。于是，他没等天亮，就拎起背包，步行四十里路回到西铺大队，没进家门，就去起集体的猪圈。下午，社员们刚下地，他已经又在打井场干起活来。社员们说，在我们西铺大队，没有“只会动嘴，不愿动手”的干部，没有“劳动蜻蜓点水不顶班，坐在办公室扯闲天”的懒汉干部。我们西铺的干部说到的，自己做到了；他们要求别人去做的，自己也首先做到了。

西铺大队的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能够做到这样自觉，是因为他们在深入开展的思想斗争中，逐步对参加劳动形成了一种新认识。西铺大队党支部认为，要使干部自觉地握住手中的锄头，就要首先让干部懂得为什么要握锄头。这个大队有个青年干部，当干部前，人称他是一员“闯将”，哪里活累，他往哪里钻；哪里活脏，他往哪里跑。当干部后，他认为自己“生在茅草屋，长在庄稼地”，是从泥水里滚出来的；如今当干部为集体管事，少握几天锄把子不碍事。于是，他下地干活少了，工作漂了。党支部发觉后，主动找他谈心，给他讲当干部为啥不能放下锄把子的道理。王国藩说：“几千年的旧社会给人们留下一个老观念，是当官发财，不劳而获，高人一等。如今，我们干部不离庄稼地，干

活不离庄稼人，亦‘官’亦民，这样就能破除‘当官发财’这个老观念，形成当干部为人民服务的新观念。”这些话，触动了这个干部的思想。他想：过去，我们斗倒了靠剥削为生、不劳而获的地主老财；今天，自己当了干部，如果指手画脚，不能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不就是那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吗？原来自己的思想在演变。这样下去，不是会顺着懒、馋、占、贪、变那条路子滑向资产阶级泥坑吗？思想认识提高了，行动上就自觉了，他又成为带头劳动的一员“闯将”。

这个青年干部的转变，是西铺大队干部实行思想革命化的一个缩影。经过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西铺大队的干部通过学习革命理论，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深入批判“上智下愚”、“天才论”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谬论，都比较好地在实行这种革命的转变。在当干部期间，他们经常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入党当干部多年了，在这期间，执行的是什么路线？带领社员改造了多少地，打了多少井，建设了多少大寨田，粮食产量增加了多少斤？象社员那样扎扎实实地劳动了多少天？自己手上的老茧有没有社员那样厚，脸晒得有没有社员那样黑？他们这样认真地要求自己，便提高了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自觉性，用汗水不断冲刷资产阶级思想的灰尘，同社员群众建立了最广泛、最密切的联系，加强了同群众的革命团结，取得了领导革命和生产的主动权。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原载1975年3月25日《人民日报》）

# 万里征途不歇脚

——记红军老战士、共产党员甘祖昌

黎明来临，朝霞满天，翠绿群山呈笑颜。在通向田间的路上，一位年近七十的老战士，身穿粗布衣，肩扛锄头，脚登草鞋，腰间别着一杆旱烟袋，同男女社员一起迎着旭日，踏着露水，说说笑笑地走着。这位老战士，就是十八年前回乡务农的老红军甘祖昌。当年，他不当部长当农民，曾在全国传为佳话。如今，十八年过去了，他仍然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分，朝气蓬勃地战斗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积极贡献力量。当地群众看到他这样大年纪，还保持这样好精神，都赞扬说：甘祖昌真是万里征途不歇脚，不愧为继续革命的先锋战士！

**“我是回来种田的，不是来当官做老爷”**

甘祖昌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经受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锻炼，全国解放后任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后勤部长。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头部三次负重伤，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使他不能坚持领导工作，领导和同志们都建议他到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去长期休养。但是，他牢记毛主席关于“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的教导，认为共产党员决不能享清福，而必须继续坚持战斗，毅然向

组织要求道：我虽然不适应在领导岗位上工作了，但我还有一双手，我要回到家乡去当个新农民，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

一九五七年，经过党组织的批准，甘祖昌带着全家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江西省莲花县坊楼公社沿背大队，踏上了新的征程。

甘祖昌一到家乡，就向党支部报到，说：“我到农村落户来了，和同志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第二天，他到商店买了几只大粪筐，第三天清早就打着赤脚，穿着黑布衫，背着大粪筐在湿漉漉的田埂上拾粪。从那以后，十八年如一日，除了生病、外出开会以外，他几乎天天和社员一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社员们关心地说：“老部长，过去你为革命吃了那么多苦，现在身体又不好，就不要和我们一样干了，指点指点就行啦。”甘祖昌笑着说：“我是回来种田的，不是来当官做老爷，怎能不劳动？”

为了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甘祖昌象当年打仗一样地豁出命来干。沿背大队是个山穷土瘦的地方，全大队三分之一的土地是冷浆田，产量低。甘祖昌带领社员群众详细地察看了六十多亩冷浆田，开了二十多次调查会，找到了改造这种田的途径。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他们在数九寒天便展开了改造冷浆田的战斗。他每天第一个来到田头，带领社员跳进结着一层薄冰的冷浆田打木桩，筑篱笆，捞稀泥，开沟排水。他们连续奋战五个冬春，把全大队的冷浆田全部改造成了大寨田，亩产量提高两倍以上。县里在沿背大队召开现场会，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全县掀起了改造冷浆田的热潮。

坊楼公社有条沿江河，两岸却有不少“望天丘”，年年

遭旱灾。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甘祖昌又爬山越岭，亲自去勘测、调查，提出了拦河筑陂的计划，并且在公社党委领导下同社员群众一道投入施工战斗。工地附近没有公路，水泥、钢筋等物资不能用车子运进去。甘祖昌组织几十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成立突击队，并鼓励他们说：“过去我们开发南泥湾，耕田没有牛用人拉；现在，汽车开不进来，我们还有双肩嘛！”他喊了声“跟我来！”就领着大家扛的扛，挑的挑，沿着崎岖的山路，把物资从七里外的地方运进了工地。炸药不够，甘祖昌就带领大家拆旧墙，熬土硝；土箕坏了自己修；钢钎坏了自己打。多少个清冷的早晨，他第一个来到工地；多少个北风呼啸的夜晚，他和社员一起挑灯夜战。五个月后，一座蓄水量五百五十万立方米的江山陂建成了，四十三里的水渠也同时完工了，五千多亩土地得到灌溉，“望天丘”变成了旱涝保收田。

甘祖昌患有好几种病，党组织和社员群众非常关心他的身体健康，一再劝他好好养病，注意休息，他总是乐呵呵地说：“没关系，这点病算得了什么？我们不能为了活命丢了革命！”只要能起床，他一天也闲不住；工作起来，常常连药也忘了吃。

一九七〇年冬，甘祖昌患了冠状动脉性心脏病，肺气肿也复发了。当时，他家邻近的屋场大队正准备修建龙潭水库，有人提出一个不切合实际的方案。甘祖昌知道后，就带病来到屋场大队，和干部社员一起翻山越岭，勘测地形。大家见他又咳又累，头上直冒汗珠，多次要他回去休息，他怎么也不依。他把汗水一擦，继续前进。经过顽强的努力，他们终于把那个地方的地形、地质等情况搞得一清二楚，提出

了一个新的方案，结果比原设计少修一条三、四里长的渠道，十多户人家也不需搬迁了。在兴建水库的过程中，他还是三天两头来到工地。后来，他病倒了，只好住进医院治疗。但他人在医院，心却在工地上。医生要他至少住三个月，他只住了三十五天，就带了些药回家投入了修建龙潭水库的战斗。

在坚持农村的社会主义道路，同阶级敌人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甘祖昌更是挺身而出，无所畏惧。

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刮起一股“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妖风。这时，有人送给甘祖昌一份所谓“百户调查”的材料，企图证明自留地收入“高于”集体收入，为单干制造舆论，并且告诉他：这个材料是有来头的。晚上，甘祖昌戴着老花镜学习《共产党宣言》。“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伟大导师的教导使甘祖昌心明眼亮。他想：中国革命几十年，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为的就是实现这个伟大理想。现在有人竟然宣扬单干的优越性，这不是想重新恢复私有制，要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去吗？他认定这是一股妖风，必须坚决斗争。第二天一早，他打着赤脚，背着挎包、米袋到群众中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农村人民公社前后变化情况和两条道路斗争现状。他花了半个月时间，走访了十个大队，最后，整理了坊楼公社两个大队两条道路、两种结果的情况对比的材料：富冲大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粮食连年增产，由原来缺粮、缺钱、缺牛的穷队，变成了年年超额完成征购任务，队有积累，户有余粮的先进队；而和富冲大队田靠田、村挨村的方陂大队，由于把集体的田分给私人种席草，任意扩大自留

地，资本主义思想泛滥，粮食连年减产，一年吃回销粮六万多斤。甘祖昌带着材料，向莲花县委汇报了调查经过，用正反两方面事例说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道理。县委根据他的建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在农村深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开展两条道路斗争，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

十几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甘祖昌和贫下中农一道，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艰苦奋斗，顶住了刘少奇、林彪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破坏干扰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妖风，促使坊楼公社不断前进。全公社先后建起了江山陂、快省陂、峙垄陂、马家坳水库、龙潭水库等水利工程，旱涝保收面积由百分之二十五提高到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不毛之地的红壤岗长出了绿油油的庄稼，低产的冷浆田变成了粮棉高产的丰收坂。全公社还兴建了十二个小型水电站，队队都用上了电灯，农副产品加工也都用上了电力，整个公社呈现一派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新景象。一谈起这些变化，社员们都称赞甘祖昌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顶梁柱”。

### “要挑老红军的担子，不能摆老干部的架子”

甘祖昌南征北战几十年，从不居功自傲。他常说：“要挑老红军的担子，不能摆老干部的架子。”他回乡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同他两个弟弟家挤在一栋房子里住。有关部门按照国家规定多次要拨款给他盖房子，他都谢绝了。村里的人说：“按照国家规定，给你盖房子是应该的嘛！”甘祖昌说：“国家规定可以给我盖房子，这是党的关怀。但是我们不应该追求这种特殊照顾。现在国家搞建设，用钱的地

方很多，我家暂时能够住下就行。”后来，家里人口增加了，老房子实在挤不下，甘祖昌就带领全家老小，利用农闲时间自己动手打砖做瓦，盖起了一栋普通民房。省民政部门的一位负责同志到他家，见窗户没有装玻璃，提出要给他买玻璃装上，甘祖昌说：“窗户上装玻璃，在城市是大众化，在我们农村，那就是‘小众化’了！”直到现在，他家的窗户还和当地社员的一样，是用塑料薄膜蒙的。

甘祖昌经常告诫自己：一个老干部，如果因为自己资格老，过去职位高，连身体也高贵起来，只讲养身，不讲革命，追求生活上的享受，天长日久，就会导致政治上的蜕化变质。回乡十八年来，他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他吃的、穿的、住的都和普通社员一样，连抽烟也是用自己做的旱烟袋，抽的是自己种的烟叶。一年夏天，他出差到江西省东乡县。县委领导同志前来看望他，找遍了饭店的套间、单间、双人间，都没有找到，最后在一个普通的大房间里找到了他，看到他和几个旅客住在一起。今年三月中旬，他到北京开人大常委会议，穿的还是在新疆穿过的那身打了几处补丁的旧棉袄，带的还是那只旱烟袋。

甘祖昌回乡后，国家仍然给予他在部队时的工资待遇。他没有把这些钱看作是私有财产，花一分钱都要掂一掂分量。他说：“工资是国家给的，是劳动人民给的，我们只有把它用到革命事业上去的责任，没有丝毫挥霍浪费的权利。”他家有副帐钩坏了，他爱人说：“买副新的吧，只要几角钱。”甘祖昌说：“只要几角钱？几角钱可以买好几斤化肥，多打十几斤粮食。”他找了根铁丝，自己做了一副。甘祖昌有条毛线裤，是抗日战争时一位烈士生前送给他的，

当时已经很旧了。甘祖昌穿着这条裤子，在南泥湾开过荒，在晋西北打过蒋匪帮，在新疆办过工厂。回乡以后，这条裤子又伴随他十几年，已烂得无法再用毛线补织，他就用布块缝上去，继续穿。甘祖昌自己这样节俭，可是，对支援发展集体经济，帮助社员解决生活困难，却十分慷慨。邻近的屋场大队兴修一个水库，资金不够，打算要国家贷款。甘祖昌知道后，便对屋场大队干部说：“不要向国家伸手，还是自力更生吧！”他主动拿出六百元工资支援他们。屋场大队干部社员深受感动，立即发动群众自筹资金，克服困难，建起了水库。为了帮助集体兴修水利、购买化肥、添置农业机械、解决社员生活困难，十几年来，甘祖昌捐出的钱占了他工资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有人问甘祖昌：你有官不当，有福不享，有钱不花，到底图个啥？甘祖昌爽朗地回答：“我们干革命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不是推翻一个剥削阶级再培植一个新的特权阶层。我们干革命是为了消灭私有制，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

### “只能给后代留下革命传家宝，不能留下安乐窝”

甘祖昌的大儿子锦荣，子女比较多。他看到社会上有的老人为子女造房子、置家具，很羡慕，便提出要父亲给他盖一栋新房。这件事，引起了甘祖昌的深思：我们老一辈人到底应该给后代留下什么？是留下一个安乐窝要他们去经营，还是留下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让他们去发扬光大？晚上，他把几个孩子都找来，同他们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他指着“废除继承权”的论述，对他们说：“留下一笔物质财富，让后代过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那是地主资产

阶级的继承观。我们无产阶级只能给后代留下革命的传家宝，不能留下安乐窝。”他严肃地批评了大儿子，又给每个孩子发了劳动手册和生产工具，并和孩子一起，订了一条“家规”：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人人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甘祖昌的二女儿仁荣，是一九七二年回乡务农的知识青年。甘祖昌手把手地教她插秧、割禾等各种农活，经常检查她的劳动工分手册，不断对她进行热爱农村、热爱劳动的教育。前年夏天，仁荣参加了队里的“双抢”突击队。一天，别人还没收工，她却提前回到了家里。甘祖昌问她为什么提前回来，仁荣回答说：“这个农活，又紧张又艰苦，我干不了，我要继续上高中。”

甘祖昌见仁荣思想出了岔子，晚上，就给她讲述了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一件事：一九二七年，甘祖昌参加革命后，和共产党员刘春元一起战斗。一天，他们在一起畅谈革命理想，刘春元说：“等革命胜利了，我们一定要让家乡变个样，山上长花果，山下变粮仓。”几天后，刘春元在一次战斗中负了重伤，倒在血泊中还断断续续地说：“要……革命……到底呀！”讲完这件往事，甘祖昌激动地说：“今天，这‘革命到底’的担子就落在我们肩上。我们一定要象当年红军那样，‘下斗争的决心，有耐战的勇气’把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土地，建设得更加美好。”爸爸的教育，激励着女儿前进。第二天，仁荣又出现在“双抢”突击队的行列。

现在，甘祖昌有三个子女在农村当普通社员。甘祖昌对他们不仅自己言传身教，还请村里老贫农给他们上阶级教育课，用村史、家史、革命斗争史和新旧社会对比，教育他们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把青春献给农村，做一个有社会主

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型农民。

甘祖昌严格要求子女，要有老红军后代的革命责任感，不能有老干部子女的优越感。他坚决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反对滥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也决不通过熟人关系“走后门”。一九七二年的一天，在莲花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念书的大女儿平荣，回到家里对甘祖昌说：“爸爸，我要去参军！”甘祖昌一听高兴地问：“选上啦？”平荣低着头，半晌才说：“爸爸，你给新疆军区写个信吧，我想到那里去当兵……”原来，平荣听说莲花县不征女兵，新疆征女兵，心想，爸爸原来是新疆军区后勤部长，只要他写个条子准没问题。甘祖昌一听这个情况，就严肃地对她说：“你想参军保卫祖国，愿望是好的，但要服从国家的需要。新疆有新疆的征兵计划，干部子女更应模范地遵守国家规定，不能闹特殊，这个后门不能开。”平荣觉得有道理，就接受了爸爸的意见。

甘祖昌的三女儿公荣在小学念书时，曾经穿过一双带洞的旧鞋子上学，有的同学笑话她太寒酸，她脸刷地一下子红了。她想，可不是，我们家还穿这样的鞋，又不是没有钱买。一放学回家， she 就把旧鞋脱掉，扔到墙根下了。甘祖昌把这双鞋拣了起来，一针一线地补好，然后交给公荣，说：

“你丢掉的不是一双鞋子，而是丢掉了劳动人民艰苦朴素的作风。鞋子破个洞，补一下还可以穿。思想上出了漏洞，资产阶级灰尘就会钻进来，可要警惕呵！”公荣懂得了爸爸的意思，就高高兴兴地把这双打了补丁的鞋穿上。甘祖昌还手把手教她补鞋袜，缝衣服，让孩子从小懂得艰苦朴素的重要。

坚持万里征途不歇脚的伟大力量，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甘祖昌就注意学习革命理论。回乡以后，不管工作多忙、困难多大，他一直坚持刻苦攻读。几年来，他读完了四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斯大林的部分著作，两次通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他学以致用，努力改造世界观，不断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甘祖昌结合回顾自己的战斗历程，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又向自己提出了一个新课题：要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不但要艰苦奋斗，为建设社会主义大厦添砖盖瓦，更要自觉地带领群众一锹一锹地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一步一步地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甘祖昌说：“人到七十不算老，革命斗志不能衰。干革命不能船靠码头车到站，一定要万里征途不歇铁脚板！”

《江西日报》记者 新华社记者

（原载1975年4月18日《人民日报》）

# 反修防修的坚强战士

——记红军团长方和明同志继续革命的事迹

一个革命战士，应该怎样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对这个问题，我们的红军团长、湖北省红安县柳林公社五大队党支部书记方和明同志，用回乡二十六年的战斗实践，作出了生动的回答。

## 从“官”到民没有万里长城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象春雷震撼着大地。六十七岁的方和明，在油灯下，聚精会神地看书学习；在收音机旁，聆听着毛主席的指示；在葱绿的田野里，和贫下中农讨论着这个关系我国发展前途的头等大事。他心情十分激动……

在旧社会，方和明同志当了八年长工，是他家第三代雇工。一九二七年夏天，毛主席把武装斗争的革命火种，撒向了鄂东地区。就在这一年，方和明参加了黄（安）麻（城）秋收起义。随后，参加了红军，参加了党。他跟随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转战南北，经历大小战斗二百多次，七次负伤，十五次立功。方和明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出了贡献。

一九四九年冬天，党组织要体弱多病的方和明在延安休养。他响应毛主席关于“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伟大号召，申请回乡务农。他说：“革命需要打仗，我扛起枪是战士；革命需要建设，我拿起锄头当农民！”

就这样，方和明怀揣党员介绍信，背着行李卷、炒面袋，满怀豪情离开延安，回到了刚刚解放的家乡。从此，这个久经战火考验的战士，从一个战场走向另一个战场，前进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

冬夜，小油灯在寒风中跳动。被蒋匪军烧过两次的小屋里，聚满了欢迎他的乡亲。大伙向他倾诉着解放前遭受的苦难，他向乡亲们畅谈着革命的伟大胜利。他鼓舞大伙说：“解放了，我们要建设新的生活！”

第二天，方和明把复员时政府给他的五百斤米，卖了二百斤，买了些农具，开始了建设新农村的战斗。

解放初期的困难，考验着英雄的战士。有人对他说：“老方啊，你有困难，为什么不跟政府挂挂钩哇？”方和明昂起头，说：“有困难自己克服，不能向国家伸手！”乡政府听到群众反映，两次派人送来棉衣、救济费，他都不要。他说：“别人比我更困难，还是拿去照顾群众吧！”

正在这时，县民政科通知方和明到七里坪填写残废证。他去了，工作人员问他：“你在部队担任什么职务？”方和明说：“我是个红军战士！”以后别人问他，他还是那句老话：“我是一个红军战士！”

是的，方和明是个永不褪色的红军战士。在他看来，一个共产党员，不能把资格、功劳、等级，当作抬高自己、索

取报酬的资本。从“官”到民没有万里长城。革命需要上就上，需要下就下。他永远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劳动者，是一颗革命的火种，艰苦奋斗在群众中。

春耕时节，他每天出工不见太阳，收工不见日头。

秋收了，他一趟趟挑起粮食去交公粮。一过秤，多交了二百八十斤。收粮的同志说：“你是老红军，可以减免。”他说：“正因为我当过红军，就要多交一点！”

在农业集体化道路上，方和明先后担任互助组长、初级社长、高级社主任和党支部书记。一九五七年，他被评为劳动模范，光荣地出席了湖北省烈军属模范代表大会。武汉军区负责人在光荣榜上看到方和明的名字，心想：是不是在长征途中带领一个营抢占李公铁索桥、掩护部队突围的那个方和明呢？他立即派人找来方和明。

二十多年前的老战友见面，格外高兴。他拉着方和明的手说：“你过去当团长，在战场上是英雄；现在回乡当农民，是劳动模范，保持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光荣传统。”

方和明回乡八年，当地群众不知道他是红军团长。会见的通讯登了报，当地群众争相传颂：“老方，有官不当官，有功不摆功，有福不享福，有难不怕难，真是模范共产党员。”有几个童年时的伙伴，找到方和明说：“老方呀，你当过团长，过去怎么连个气都不给我们透呢？”

方和明微笑着说：“这有什么可说的？我这个穷孩子，能够参加革命，全靠党和毛主席引路。功劳应该归于党、归于人民、归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只不过是个红军战士，做了我应该做的事。”

## “共产党员的胳膊应该往外弯！”

“老方是我们反修防修的一竿旗！”社员们总爱这样赞扬方和明。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方和明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掌握反修防修的思想武器。他带领广大党员、群众，狠批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他谦虚谨慎，不吃老本，不摆架子，平等待人，和贫下中农的心紧紧联在一起。劳动，他一样滚一身泥巴，流一身汗，每年要做两百多个劳动日；分配，他同社员一样，从不多分一草一木；看病，他一样挂号候诊，不搞特殊……

一九七一年，方和明的老家四屋岔要修水库，县委、区委动员他搬迁。他们看到老方的年纪大，身体又不好，叫他搬到县城或七里坪镇上安度晚年。

一个共产党员，应当怎样度过自己的晚年，是贪图安乐，还是继续革命？方和明想：住在农村是要艰苦些，正因为艰苦，更需要我们去奋斗，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他再一次向党组织表示：“我在农村是钉了钉子转了脚，拔不出来的！”

方和明搬到了落后的余家垅生产队。消息传开，贫下中农很高兴，热情地议论着为他盖新屋。方和明边听边琢磨：大伙这样热心地关心我，总以为我是一个对革命有功的人吧，应该享受一点了。如果说我参加革命时间长一些，受党的教育多一些，那么，觉悟就应该更高，要求应该更严，在生活上，我怎能比贫下中农出格呢？想到这里，他恳切地对

大伙说：“我是一个普通社员，房子要修得和贫下中农一个样。”

方和明平凡而高尚，和社员一样，又不一样。

每天天刚亮，他背起粪筐，拣粪交集体；他宁愿穿着从延安带回的旧棉军装，却把政府照顾他的新棉衣转送给贫下中农；当贫农的孩子病了的时候，他半夜三更去求医；……

方和明关心群众比关心自己为重。对于这些事，有人不解地说：“自古以来，河弯水弯，胳膊往里弯，没见过象老方这样胳膊往外弯。”方和明说：“共产党员要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胳膊应该往外弯！”

无私才能无畏。方和明在反修防修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牢记党的基本路线，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敢于批判和抵制各种错误倾向。

一次，有的干部背着他，把队里的杉树苗运往城市去卖高价。方和明拦住卡车说：“你们这样做，要把车往那条路上开，头脑里的方向盘是往那边转？同志呵，我们不能往钱眼里钻，只想赚钱，忘了路线。要记住，我们是共产党员呀！”他教育干部纠正资本主义倾向，把五万多株杉树苗支援了公社和兄弟大队林场，绿化了一千多亩荒山。

这个大队过去由于受刘少奇“物质刺激”、“工分挂帅”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对干部曾有过“高工分、高分值、高补助”的规定。方和明不但带头拒绝这种不合理的规定，并且多次说服干部不要搞特殊化。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时候，干部们回顾了这种“三高”的错误做法，认识到这样发展下去，就有蜕化变质的危险。方和明说：“对资产阶级思想，只能拔苗，不能浇水，追肥。我们要冲破旧思

想的牢笼，从旧传统的框框里解放出来！”

柳林公社五大队的干部，在方和明的带领下，就是这样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反修防修，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每谈到这些事情，党支部委员们就说：“老方和我们一样，都是共产党员，可他站得总是高一些，看得总是远一些，想得总是深一些。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有一颗红亮的心，心里亮着阶级斗争的风雨灯！”

### “把红旗扛到共产主义”

方和明回乡后，一直把根子扎在群众中，把脚板踩在泥巴里，始终不脱离劳动。他常说：“不劳动就会忘记大目标，不劳动就会忘本变修。”

十丈山麓，曾是黄麻起义指挥部的所在地，被国民党反动派烧杀成了“无人区”。一九六〇年夏，方和明带着一批革命复员军人和烈军属，在先烈牺牲的土地上，砍荆棘，搭草棚，一口葛根粉，一口山泉水，创建“八一畜牧场”。

“苦吗？是苦哇！”方和明对大伙说：“创业好比针挑土。革命先烈为开辟社会主义道路，连生命都不要，我们还怕苦吗？”方和明总是起五更，睡半夜，七、八斤重的挖锄不离手。别人歇荫，他劈荆开路；扑灭山火，他冲在最前头，头发烧焦了，仍继续战斗。他常说：“为了革命，是老虎我也要咬它几口！”

方和明把革命利益当作第一生命。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他带领社员劈山开渠，拦河筑坝。十多个冬春，每天眼睛一睁，忙到见星。他们先后修起二十多处水利工程，使

大队百分之八十的农田旱涝保收，粮食亩产连年超千斤。群众敬佩地说：我们的方团长，真是革命加拚命！

一年夏天，连降暴雨，方和明巡田护坝，几天没有合眼。一天晚上，他和两个队长，冒着倾盆大雨，再次来到羊角塘水库。眼看洪水就要漫过坝面，水库面临着被冲垮的危险。方和明把绳子往腰间一拴，准备下水开漏。队长一把抱住他，说：“你不能下。我们年青，能顶住！”

漏口小，山洪大，库水继续上涨。方和明跳进水里，锄头挖，双手掏，加深加宽溢洪道。手指甲扒脱了，脚被石头砸破了，他仍然坚持战斗。

这一夜，方和明七进七出，从田畈摸到坝上，从坝上摸到田畈。帮他烤衣服的老伴，见他一身水，一脚血，心疼地说：“是纯钢，也只有百把斤，你把老命拚上了！”

人们也许会问：方和明年老多病，为什么能继续保持革命战争时期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

还是用事实来回答吧！

三伏天，骄阳似火，大地生烟。方和明带一群女社员，在蒸笼似的夹山冲里收早稻。晌午，大伙收工回家，方和明仍在田里拣谷穗。过度的疲劳，中耳炎、痔疮的折磨，使这位英雄的战士突然昏倒了。

“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方和明猛一下抬起头来，望着当年鏖战的雾仙山，耳边仿佛响起大别山反“围剿”的枪声，看到在大巴山阻击战中倒下去的战友。他想，只要我活着，就要继续冲锋！

方和明站立起来，踉跄地走了几步，又昏过去了。当他

第三次昏倒的时候，恍恍惚惚听到有人喊：“老团长！老团长！”他睁开眼睛，看见贫协组长陈文合抱着他，难过地说：“不让你出工，你总是抢着干。你看，把你累成这样子，我们心里怎么好受！”

方和明一把攥住陈文合的手，嘴唇微微颤动。他有多少话要说啊！一九二九年四月，是方和明拿着一张乡苏维埃的介绍信，扛着红旗，走在排头，带着陈文合的哥哥陈文连等七十一个青年，参加了红军。方和明永远不会忘记：同他一起参军的七十一位同志，为了革命，都先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这个幸存的第七十二个战士，无限深情地说：“文合，先烈们没有看到今天的幸福。每当想起他们，想起他们没有完成的事业，我怎能不拚命干呢？”

方和明懂得革命是万里长征，要注意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他经常教育青年说：“要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把红旗扛到共产主义！”

有一年春节，东方刚亮，方和明拄着拐杖，踏着积雪，扑扑颠颠来到陈家岗，把三个武汉知识青年接到家里吃饭。方和明对知识青年讲起长征途中的艰苦岁月。那时候，不管斗争多么艰苦，同志间处处充满着阶级友爱。年纪大的背着“红小鬼”，体质好的扶着伤、病员。过草地，方和明把仅有的五斤粮食，分出大半给受伤的战友，自己吃皮带，咽草根。他说：“同学们，幸福来之不易呀！没有‘两万五’，哪来这顿饭！当年，先烈们洒的是饿肚子血，今天，我们流的是饱肚子汗。只有不忘过去，才能开拓未来！”

几年来，在党支部和贫下中农的培养教育下，大批知识青年成为农村骨干。大队十一个领导成员中，有六个是青

年。他们说：“我们前进的每一步，都倾注着老团长的心血！”

大别山麓，杨柳河畔，经常有一队队红卫兵、解放军战士，扛着红旗，爬山涉水，前来向方和明学习。这位头发花白的老战士，总是说：“对资产阶级专政是一场长期的斗争。我要和大家一起，紧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

《人民日报》通讯员

《人民日报》记者

（原载1975年6月5日《人民日报》）

## 赤脚书记廖锡龙

“你要问阿龙吗？他当了‘官’，仍和我们一样劳动，大家都叫他赤脚书记。……”平阳县城西公社的干部、社员就是这样称赞自己的党委书记廖锡龙同志的。十多年来，在毛主席的《五·九批示》指引下，阿龙自觉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道上不断前进。

### 不要脱产 又要工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廖锡龙担任了中共浙江省委候补委员、省革委会委员、温州地区革委会常委、中共平阳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等领导职务。地位变了，但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不变。他牢记毛主席的《五·九批示》，仍然同过去一样落实到生产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与社员一本账分配。十多年来，他每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都在一百二十天以上。有人感到他这样的“官”没见过。廖锡龙说：“毛主席在党的九大期间告诫新选进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基层同志**不要脱产，又要工作**。我们农村干部更应该自觉地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不脱离劳动，不脱离贫下中农，这样才能有利于破除自己头脑中小生产者的旧观念，抵制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阿龙这样说，也

是这样脚踏实地地做。十多年来，廖锡龙在公社里没有办公桌，不少问题就是在田边、地头发现和解决的；而更多的工作，则是放到收工以后和晚上去做，尽量不占用集体生产劳动的时间。

廖锡龙外出开会和参加社会活动多，他更是时时提醒自己：千忙万忙，参加劳动不能忘。一九七四年春季，他在杭州参加省委召开的一个会议，每逢到会议休息日，他就跑到住地附近的西湖公社双峰大队第二生产队帮社员们插秧。会议开到六月中旬，他想，浙南季节来得早，眼看就要到大忙了，如果不早点赶回平阳，就会影响抓革命、促生产。于是，他向领导请假，要求提前回去。领导准假的当夜，他就乘火车赶到金华，次日凌晨，又立即排队买去温州的车票。……到家的第二天，他就与社员们一起下地，铲草皮，造沤肥，同时利用劳动空隙时间召集干部研究深入批林批孔，搞好夏收夏种的问题。

有一次，廖锡龙外出开会时间较长，回到生产队后，下田插秧，刚一弯腰，便觉得两眼发黑；挑重担子，也觉得分外吃力了。他想，人一不劳动，就会变。于是，他一面向地委写报告，要求减少会议活动，以便更好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一面有意识地在劳动中给自己压重担：别人插一垌秧，他要插一垌半到二垌；别人中午歇息了，他去田里和泥灰；别人收工时往回走，他把田边路上的牛粪拾回去。有的“好心”人劝他说：“你也是五十出头的人了，何必这样拚命？”廖锡龙说：“参加劳动不是我们干部个人的事，而是反修防修的大事，不拚命干怎么行？！”

## 当社会公仆 不搞特殊化

城西公社的广大贫下中农说：“阿龙从不打个人的小算盘，顶得住‘资产’风，过得硬！”

廖锡龙成年累月与群众一起在泥巴里摔打，同贫下中农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在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时，他重温了毛主席的《五·九批示》，还结合学习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的有关章节，感到消除等级差别和特权观念，是革命导师的一贯思想。为了当好“社会公仆”，他常常以《法兰西内战》中关于巴黎公社所有公职人员都只领取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的一段论述来告诫自己：当了干部，要时刻想到权力是谁给的，千万不能搞特殊化，把为人民服务的职责变为谋取私利的特权，要以实际行动狠批林彪反党集团对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诬蔑，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他家七口人，住在一间半矮小的旧屋里。他爱人看到孩子长大了，住房挤，家具少，要廖锡龙设法弄点木料，修建房屋，做点家具，可阿龙总是不放在心上。最近几年，国家每年都有木材拨给城西公社解决社员住房问题，在分配木料时，阿龙总是先考虑需要木料的贫下中农。他家的一副床板，使用年久了，已很破旧，他爱人有时又提起弄木料的事，他总是说：“我们不能比社员特殊，要先照顾更困难的户。”并跟爱人一起忆苦思甜，激发她的阶级感情，使她和自己想到一块。

廖锡龙的一个女儿在公社林场劳动，那儿条件比较艰苦。有的人对他女儿说：“你父亲有职有权，何不叫他替你

换个地方？”女儿看到有的青年通过“走后门”离开了农业劳动，不免心动起来，也想要父亲把她安排到社办企业去工作。廖锡龙知道女儿受了社会上不正之风的影响，便说服女儿安心在林场锻炼，教育她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他对女儿说：“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不能滥用职权开后门。”

平时，廖锡龙十分注意防微杜渐，不给资产阶级思想以可乘之机。他外出开会住旅馆，总是要服务员安排差一点点的房间。一次，他和平阳县的二十多个同志从杭州开会回来，到了温州一个招待所里，由于房间比较紧张，二十多人只能临时在会议室加铺。廖锡龙与这个招待所的同志比较熟悉，有人就叫他去找服务员给自己另安排一个房间，但他还是与大家一起睡在会议室的地板上。

### 学习革命理论 捍卫《五·九批示》

今年春节前，廖锡龙在省里听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传达，兴奋得睡不着觉。他把毛主席的指示一字一句抄在笔记本上，边学边回顾自己的斗争实践，走毛主席《五·九批示》指引的道路，当一辈子“种田干部”的信念更坚定了。

廖锡龙和城西公社的干部，从公社化以来，一直不脱离生产，不领国家工资，不吃国家粮食，与社员一本账分配。这样的干部，贫下中农打心眼里欢迎。但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煽阴风，放暗箭，妄图把城西公社的干部拉到脱离劳动、脱离群众的斜路上去。他们散布种种谬论，胡说什么城西干部不脱产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以劳动代替政治，以制度代替方向”，并煽起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挑动一些人去闹补发工资。在激烈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面前，廖锡龙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坚定地捍卫毛主席《五·九批示》，向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帮助大家擦亮眼睛，分清路线是非。当一笔“补发工资”发到城西公社时，廖锡龙把它扣住了。有人说：“既然上面发下来了，那就往下发吧！”廖锡龙坚决不同意。他说服公社干部，把这笔钱退了回去。

廖锡龙在回顾这一段经历时想，林彪反党集团诬蔑干部到五·七干校劳动是“变相失业”，城西公社的一小撮阶级敌人攻击干部参加劳动也有一套反动的谬论。这伙无产阶级专政的死对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利用资产阶级法权观念来煽动干部离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我们如果不弄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就不能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为了弄通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意义，廖锡龙把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联系起来学习，然后在公社党委、革委会和大队干部会上带头谈体会。他说：“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大措施。如果在社会主义阶段不讲革命的理想，不讲共产主义思想，不逐步缩小三大差别，那么，资产阶级法权就得不到限制，林彪一伙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就会得逞。”他看到公社里有些搞会计等业务工作的同志，有时忙于日常事务，忽视了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与群众的关系疏远了。于是，就在公社党委和革委会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公社党委根据他的

意见，检查了干部参加劳动上的一些薄弱环节，制订了改进措施。

在最近召开的省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上，廖锡龙在和同志们交流学理论的体会时，高兴地说：“最近我初步弄懂了一些理论问题，今后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投入三大革命运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更明了！”

《浙江日报》记者

（原载1975年5月9日《浙江日报》）

# “老盛掌印把子，我们放心！”

——记受群众拥护的好干部盛建中

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千百万革命的同志，肩负阶级的重托，在领导工作的岗位上，为党和人民掌握着一部分权力，履行着时代赋予的光荣的历史使命。

然而，当你掌握某种权力的时候，应当怎样看待和运用这种权力呢？

这是摆在每一个领导干部面前的一张发人深思的考卷。

全省著名的劳动模范，中共桐庐县委委员、桐庐农机厂党委副书记盛建中用实际行动写出了一份很好的答案。他担任领导工作二十多年来，自觉抵制“资产”风，坚持为无产阶级掌权，不谋私利，当“官”不搞特殊，办事不离党的原则，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厂里的干部群众赞扬说：“老盛掌印把子，我们放心！”

## 当干部岂能要照顾

今年新春佳节，一位年近六旬、鬓角斑白的老人，兴冲冲地从萧山乘车来到桐庐，探望他的弟弟——盛建中。他一踏进盛建中家的门槛，扫视了屋内的一切，顿时愣住了：

“咦，弟弟怎么还住着那么小的老房子？”

盛建中的哥哥在二十年前曾来过这里。那时，他看到盛

建中的住房又矮又小，曾向建中提出换间大一点、好一点的房子。可是，二十年过去了，建中家里添了六口人，依然住在老房子里。这次，哥哥奇怪地问弟弟：“建中，你当了二十几年干部，怎么不去调一个好房子？”

盛建中笑笑说：“当干部不能追求特殊照顾。房子小，挤一下还可以。”

老盛一家十口人，挤在两间低矮的平房里。他爱人看到别人一家一家搬进了新房子里住，对老盛说：“儿女大了，住房那么挤，你也不去想个办法！”

听了这话，老盛心里顿时象决了堤的水，翻腾开了。他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当干部难道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去谋求个人私利？“绝不能这样！”那是剥削阶级的恶习，与我们工人阶级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老盛想起了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想起了自己刚走上领导岗位时，老工人语重心长的嘱托：“建中，你当了干部，可要为我们工人阶级争气啊！”老盛心房里忽地打开了一扇窗，豁然开朗：对啊！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的官老爷。自己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就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可丝毫不能去为个人谋私利、搞特殊化。老盛主动说服了爱人，仍然住在原来的旧房子里。

有一次，县委领导考虑到老盛家人口多，住房挤，就叫房管部门给他安排了大一点的房子。老盛想到有的同志的住房不宽敞，就婉言谢绝了组织上的照顾，把房子让给了更需要的同志。

事隔几年，厂里造起了一幢职工宿舍。厂党委考虑到老

盛五十多岁年纪，家离厂又有二里多远，刮风下雨来去不便，决定分配给他一个房间。老盛觉得厂里集体宿舍房子比较紧，又把分配给他的房间让给了工人住。

后来，厂里又造起了一幢四层楼的职工宿舍，工人的住房宽裕了。厂总务部门的同志想，这回给老盛安排一间房子，他总不会再推辞了。谁知，找老盛一讲，又碰了个“软钉子”。老盛说：现在厂里还有一部分职工住在外面，等其他同志都安排到厂里来住了，那时再考虑我的住房也不迟。

“当干部岂能要特殊照顾！”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老盛三次把组织上照顾给他的房子让给别人。

### 吃苦的工作争着干

享受让给别人，吃苦的工作却争着去做。——这是盛建中的性格。

有一年夏季，桐庐县境内久旱无雨，农田急待灌水。为了支援农村的抗旱斗争，厂里决定组织小分队，下乡帮助社队突击安装抽水机。老盛争着报了名。大家关切地劝他：

“你年纪大了，身子又有病，炎暑时节到山区农村干这项工作吃不消，还是不要去吧！”老盛想：同志们不让我去，这是对我的照顾；但自己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如果不从严要求，而是心安理得地接受这种照顾，慢慢地就会滋长特殊化的思想。于是，他坚决要求到艰苦的劳动中去磨炼自己的意志，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等级观念”的垃圾！

老盛与同志们一起，头顶烈日，翻山越岭，奋战在抗旱斗争第一线。有一次，他带领工人在凤川公社一个山坞里帮助安装五级提水机埠。四周，高山陡峭，透不进风；头上，

骄阳似火，烤得人又闷又热。年逾半百、体弱多病的老盛，挺着腰板，与工人一起抬着三百多斤重的电动机，嘴里大口大口喘着粗气，额上豆大的汗珠不停地往下掉。突然，他感到胃里一阵剧痛，脸色顿时变得苍白。在场的同志扶着他，关切地说：“盛师傅，你歇歇吧，我们来干！”而盛建中只用手揩了揩额上的汗水，马上又站起身，坚持战斗。

吃苦争在前，享受让别人，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一心为革命的崇高品德，也是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有力回击！

### 把社会主义关不含糊

在领导岗位上，经常要与各种各样的事情打交道。当自己手中有了某种权力的时候，办事情，处理问题，是坚定地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上，还是讲“人情”，拉“关系”？这对领导干部来说，又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老盛是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呢？

这里，让我们先说一说发生在老盛日常生活中的两件事。一件事是：去年夏季的一个傍晚，盛建中骑着自行车刚出厂门，迎面急呼呼地跑来一个中年人，头上冒着热汗，手中提着一根拖拉机链条。老盛一问，才知道他是胜峰公社的拖拉机手。这天，拖拉机手开着拖拉机给大队运输东西，哪晓得驶到途中，拖拉机链条上的一只销子失落了，抛了锚，他只好到农机厂求援。不巧，这天正是厂休日。老盛明白了这回事后说：“我去帮助解决！”老盛整整花费了一个多小时时间，东找西寻，好不容易从废铁堆里找到了一只旧销子，帮助拖拉机手解决了困难。

另一件事是，老盛的一位老朋友，一次，特地上门来，说是有一个同事的儿子，想从农村来厂做临时工，请老盛帮帮忙。这位朋友说：“你是厂党委副书记，只要你开口说一下，事情准能办成。”老盛想，到工厂做临时工，要有劳动部门的介绍信。我不能因为照顾个人的情面，利用职权，干违反国家政策的事。他对那位朋友说：“你提出的要求不符合国家政策规定，这个口我不能开！”

对这两件事，老盛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前者，主动关心，热情支持；对后者，心如铁石，坚决不办。两种态度，一条标准：看是不是对社会主义有利。多年来，老盛总是用这条标准来衡量一切事情，看该办还是不该办。他常说：领导者手中的权力是用来把“关”的。对社会主义有利的事，就要敢说敢干；对资本主义有利的事，那就不管是熟人、同事、朋友、亲戚，哪怕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也要敢管敢顶！

一次，老盛接到有关领导部门一位同志的电话，提出要厂里帮助“兄弟单位培训”一名技工。起初，老盛不知底细，觉得为兄弟单位培训技工，这是正常的社会主义协作，是应当大力支持的，便答应了。过了一些日子，那位要求“培训”当技工的人，背着铺盖来到了厂里。老盛仔细一了解，发现这人并不是兄弟单位的工人，而是一个社会青年，想到厂里学点技术，便于今后有机会可以进工厂当技工。老盛发觉这事不对，准备立即把他退回去。但事情是自己的上级叫办的，退回去会不会弄“僵”关系呢？正在踌躇之时，他想起了毛主席的亲切教导：“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

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顿时觉得心明眼亮。他想：我如果顾了个人“情面”，在一个人身上失去了原则，就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损失，平时自己常说的要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站好岗，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毛主席的教导，给了老盛无限的勇气和力量。他主动说服了有关领导部门的那位同志，把来厂“培训”的人退了回去。

### 顶“资产”风过得硬

人们也许会问，盛建中为什么能始终如一，保持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优秀本色？重要的一条，是因为他牢记毛主席的伟大教导，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在一切领域，在一切阶段上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解放初期，摸惯了锄头、扳手的盛建中，被推上了领导岗位。刚上任，资产阶级的“香风”便向他扑来。一天，有个资本家一见老盛，就把大拇指翘得老高，连声夸奖：“盛厂长技术高明，业务熟悉，是一个有贡献的人物。”老盛不理他那一套，“刷”地投过去两道警惕的目光。那个资本家讨了个没趣，尴尬地溜走了。此后，这个资本家表面上拍马奉迎，暗地里却与人民为敌，进行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罪恶勾当。老盛掌握了敌情后，便和工人一起，狠狠地批斗了这个反动资本家，揭露了这个反动资本家的丑恶嘴脸。

斗争，考验着老盛；老盛，也在斗争中得到了教育。他联系这件事，一遍又一遍地学习了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

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老盛越学越感到亲切，他想：毛主席他老人家讲得多么深刻！自己要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永远保持工人阶级的优秀本色，就一定要打退资产阶级“糖弹”的袭击，自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正是这样，二十多年来，老盛始终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做到“香风”吹不倒，“糖弹”打不垮，拒腐蚀，永不沾。

有一次，绍兴阮社公社因为抗旱急需，派人来厂要求设法解决一台水泵。老盛想，支援农业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就立即与厂里有关同志作了商量，很快帮助解决了。这个社员很是感激，为了“表表心意”，临走时买了条飞马牌香烟，放在老盛家里。老盛见到这条香烟，回忆起了一件难忘的事情：那是在一九六四年，老盛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在京期间，他怀着崇敬的心情，访问了铁人王进喜。他俩抚今思昔，感慨万分。在谈到现实阶级斗争状况时，铁人王进喜亲切地告诉老盛：“解放前，地主资本家为了盘剥劳动人民，逢年过节，硬要强迫穷人给他们送礼；现在，我们掌握了印把子，也有人向我们请客送礼，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作风，我们不干！”

铁人铿锵有力的话，如今又回响在老盛的耳边。老盛看着面前的这条飞马牌香烟，心里涌起了一阵激浪，他想：这个社员感谢性的赠送，虽然是一片好心，但它是一种旧传

统、旧习惯。俗话说，“毛毛细雨湿衣裳”。过去有些干部蜕化变质，开始不也是从小事情上打开缺口，沿着懒、馋、占、贪、变的邪路滑下去的嘛！老盛想到这里，心里更加踏实了：这条香烟坚决不能收！但是，那个社员已经离开桐庐回去了，香烟无法送还给他，老盛就如数寄去了烟款，并写了一封充满革命激情的信，要他与旧的传统观念决裂，树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风尚。这位社员接到老盛的信，十分感动，特地写了一封回信，表示一定要向老盛学习，共同抵制不正之风。

今春以来，老盛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心里更加亮堂了。他想，解放后，地主资产阶级虽然被推翻了，但地主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如果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一切领域、一切阶段上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自觉抵制“资产”风，就会被资产阶级所俘虏，无产阶级手中的领导权就会有得而复失的危险，我们的党和国家就有可能改变颜色。老盛望着奔流不息的富春江水，激动地对自己说：“车没有到站，人不能歇脚，继续革命的路长着哪！”

桐庐县第七期工农通讯员学  
习班、《浙江日报》记者  
(原载1975年5月27日《浙江日报》)

## “革命老黄牛”

——记吴发琴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事迹

在义东公路上，有一位年近六十的老工人，一会儿拌料垫路，一会儿推土扫沙，经常忙个不停，哪里任务艰巨，就在哪里出现。他，就是被人们誉为“革命老黄牛”的吴发琴同志。

吴发琴同志，现在是东阳县公路段的副班长。他一九三八年一月入伍，次年入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多次负伤，屡立战功，曾任班、排、连长，营党委委员，区人武部长等职。因为在战争年代留下了难以治愈的脑伤和重听，使他不能继续胜任领导工作，于一九五五年复员。

二十多年来，吴发琴始终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困难压不倒，“资产”风吹不垮，朝气蓬勃地迈进在毛主席指引的继续革命大道上！

### 红 心 不 变

在战争年代，吴发琴一心想的，是跟着毛主席闹革命，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解放后进了城，发琴同志仍然是一心想的革命，没有向党伸手要地位、闹待遇、讲享受，红心不变。

复员前夕，领导上问他有什么要求？老吴一再表示：“干革命嘛，哪里都一样，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

开头，领导上安排他回农村，他就安心当农民。两年多时间，从来没有向领导上提出过个人的要求。

一九五八年，县委要他带领一百多名复员军人去创办一个砖瓦厂，他第二天就来到工地。那里住草棚，睡地铺，条件很差。白天到三十五里路外挑耐火砖泥，晚上在月亮底下做砖坯，每月只发十几元钱的生活费，生活很艰苦。有几个人来找吴发琴，要他当代表，去向领导提提要求，换个轻便一点，待遇好一点的工作。老吴听了摇摇头说：“我们都是革命战士，应该经常想一想我为党做了什么？没有理由向党伸手，更不能把自己的资历和功劳当作本钱装在口袋里，到时候拿出来向党要报酬。”他领着大家一起学习革命理论，回忆革命传统，发扬革命精神，艰苦奋斗，大干社会主义，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一九六一年，吴发琴被调到养路段当工人。养路工作中有一项回沙作业，使护路沙不起沙波浪，也不滑散。一次，拉回沙器的黄牛病倒了，怎么办？老吴说：“牛病了，就人拉，以人顶牛，回沙不断！”他不怕吃力，也不怕有人讥笑，带头拉着回沙器，战斗不息，一天来回十几公里。有个在吴发琴当区人武部长时挨过斗的反革命分子，却乘机造谣，胡说什么吴发琴犯了错误，削职为民了。一些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严重的人，也嘀嘀咕咕：这老头子有藤椅不坐，有木壳（枪）不挂，到公路上背牛轭，图个啥？老吴牢记毛主席关于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勤务员的教导，认为“当领导、扫马路都是为毛主席革命路线战斗”。他毫不动

摇，昂首挺胸，坚持在岗位上，以实际行动回击了阶级敌人，也深深教育了那些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严重的人。在他的模范行动影响下，职工们团结一致，大干苦干，使这个养路段成为全省公路战线的先进单位。

吴发琴那颗革命到底的红心，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放射出新的光彩。养路工收工，可以搭车回工房，老吴不搭车，他说走路回来，可以一路观察公路的情况。逢年过节，他让别人回家，自己却留在道班里。有一年，同志们硬要他回去过年，他走了，刚到家，下起大雪来，大年初一他就赶回道班扫雪。他在养路班里是这样，走出养路班也是这样。前年，他参加金华地区春节拥军慰问团。每到一地，进有人接，出有人送，而他却老想着为革命多做贡献。住招待所，他天天起早帮服务员打扫房间、走廊；上车下车，他抢着装卸行李。平时很多单位请他作报告，介绍经验，有的派车子去接，他宁肯花力气跑路。工人同志见此情景，无不称赞：“真是革命老黄牛，拉车不坐车！”

### 传 统 不 丢

在战争年代，吴发琴是个猛打猛冲，不知世间有困难二字的硬汉子。在今天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他继承发扬着我党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刚到养路班不久，外地介绍一种养路先进经验，需要一种“绿豆沙”，要下水去捞。当时天气冷，有人提议到明年春暖以后再搞，吴发琴坚决不同意。他说，这点困难算什么！立即带头赤脚下水，干了起来。一九六九年九月，一场暴雨山洪，阻塞了小溪便道，公路不通了。怎么办？老吴对一位青年工人说：过去打仗，只要还有

一个人，也要保住阵地，现在我们虽然只有两个人，也要保证公路畅通。这一老一小带着冷饭到工地，不怕水深齐腰，整整干了一天半，在周围群众的支持下很快恢复通车。

在道班里，他不仅出工在前，收工在后，抢干重活，而且把烧饭、种菜、挑水、养牛养马这些规定轮流干或分工别人做的事情，也寻找各种理由“抢”了过来。有人看他累，劝他少干点。他笑笑说：一个人多在困难里磨磨有好处。

对于吴发琴来说，最大的困难莫过于疾病对他的折磨。一九六八年春天，他患了癌症。由于病情复杂，在金华开刀后，又转到杭州动了第二次、第三次手术。连续三次开刀，再加上原有的肺穿孔、关节炎，真是里外一身病。医生建议长期休养。出院后，段领导考虑医疗方便，把他挽留在县里，并指定专人照料。哪知老吴是一个病痛压不倒、双手闲不住的人，离开工作，丢掉扫把，就觉得非常难受。能站起来走走了，他就下地扫院子，挖阴沟，三番五次找领导，要求回到班里去。领导上给他闹得没法子，把他送回家去养病。没过几天，他又摇摇晃晃跑到公路上去了。同志们要他养好病再干。老吴恳切地对同志们说：“身体差，更得抓紧干，我就担心这有限的时间会被疾病夺走。”大家拗不过，只得“约法三章”：最多只能干半天；只准干轻活，扫扫沙；以一公里路为限。可是，老吴上了公路，早把它忘得干干净净，挖沟、挑泥、补洞，轻活重活样样干。就这样，在公路上度过了他的“病假”。

前年，吴发琴同志来到南马大桥建设工地。领导上交代：工地上走走，照看照看就行。用意是让老吴换个环境，多休息。可是他见仓库保管员忙不开，就去帮助卸水泥，扛

木头，拉沙垫路，修旧利废。施工了，他就到工地上劳动，甚至白天黑夜连着干。这里有人夺下他的扁担，他换个地方操起锄头。领导上叫他“照看照看”，他却什么都干，根本不受分工的限制！有天下午，老吴干着干着，突然天旋地转，倒在路边。工人们闻讯后都赶来看望他。段负责人陈金星从老吴的病历中发现了一叠医嘱和证明，上面写着：“癌症需要复查”，“两肺上下均有阴影伴空洞，血小板不到四万，建议休息三个月”……原来，他把这一切都隐瞒了！还有的同志从他身上找出一个装有止痛片的药瓶子，原来他就是靠止痛片的帮助坚持下来的啊！

社会上曾经有人用“残烛”两字来形容吴发琴同志的生命。意思是活不长了，奉劝老吴在“烛尽光灭”之前，留点光亮照照自己吧。然而发琴同志却常说：我是干革命来的，只能革命到底，不能享福到老！他胸怀朝阳，朝气蓬勃，用继续革命的矫健步伐，把这种资产阶级的人生哲学踩得稀巴烂！

## 一 尘 不 染

吴发琴同志处处严格约束自己，坚持政治上严要求，生活上低标准，艰苦朴素，廉洁奉公。

对国家财产，哪怕损害一分一厘，老吴也严肃对待。有一次，食堂里少了一把菜刀，老吴心里很难过。同志们宽慰他：你辛辛苦苦为同志们烧饭，我们都感激你，丢了把菜刀，公家再买一把就是了。老吴却说：公家的钱开支一角一分，也得符合规章制度。菜刀是我经管的，丢失了，就应该赔偿。他立即跑到横店，买回一把。

他自己这样做，也严格要求别人这样做。南马工地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工人的打火机没油了，用了公家的汽油。老吴看到了，当面提出了批评。那人不服气：“只值几分钱，芝麻绿豆大的事，何必小题大作！”有的人也劝老吴，不要为这点子事伤了同志感情。老吴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联想到工地上人多手杂，损害公物的现象经常出现，这类“小题”不“大作”，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就会腐蚀我们工人阶级的肌体。他建议召开职工大会开展讨论，会上，他带头联系实际，批林批孔，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他说：革命者只能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决不能做任何损公肥私的事情。拿公家一滴油、一枚钉，看来事小，却反映了我们的世界观还没有跳出小生产的圈子。再说损公肥私，越走越远，就会陷入修正主义的泥坑，可是一个大事。大家通过学习、批判，普遍提高了爱护公共财物，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自觉性。

斗争的实践使老吴懂得：年轻一代缺乏阶级斗争的经验，对“资产”风的免疫力不强。因此，他更加关心年轻一代的成长。

湖溪道班有个青年工人，刚从外单位调来时，不安心工作，干活没劲。老吴一打听，原来是受了“资产”风的影响，说什么养路工是“一把扫帚一把锄，春夏秋冬吃尘土，风吹雨打日头晒，不管物资管吃苦”。发琴一连几天吃过晚饭跑五里路到湖溪，同这个青年谈心，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帮助他提高思想觉悟。发琴语重心长地说：管吃苦是光荣的，想甜头、怕苦头，管起物资来也会摔跟斗。后来这个青年进步很快，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

吴发琴的大儿子东亚，也是个养路工。一次，儿子提出要买块手表。老吴皱起了眉头：不是手表不能买，穿了几天工作服，就讲起穿戴、享受，可不是好苗头。当天，他就回到家里取来一部《毛泽东选集》，又到新华书店买来一本《雷锋的故事》，交给东亚，并严肃地指出：“你现在最要紧的不是戴手表，弄清钟点，而是在脑子里装个方向盘，辨清路线。”引导儿子学习革命理论，努力改造世界观。

## 战 斗 不 息

吴发琴同志是湖南平江人，出身很苦，一家革命。父亲是当年农民运动的骨干，被国民党杀害。哥哥参加工农红军，战死在长征路上。吴发琴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先是给地主放牛，吃够苦水，十八岁那年，抱着杀敌报仇的决心投奔革命。在革命大熔炉里，认真学习，追求真理，逐步成长为具有较高路线觉悟的出色战士。他在继续革命的大道上，每前进一步，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结果。吴发琴几十年如一日，坚持看书学习。他没上过一天学，识字不多，但他不畏难，坚持每天读一点，有时开会、工作到深夜，也从不间断。日积月累，他读完了《毛泽东选集》，还学了不少马列著作和语录。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后，吴发琴立即进行了学习。“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对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老吴认真学习，细心领会，联系自己世界观的改造，严肃地进行思考。老吴想，毛主席号召全国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也正是为了使我们在理

论和实践上都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我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做了些什么？”吴发琴给自己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回顾这几年来，虽然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的，但是资产阶级思想的灰尘还会经常影响自己，世界观的改造还有差距。学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他的眼睛更亮了，对自己的要求也更严了，坚持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指导自己的言行。不久前，老吴调渣油路指挥部工作。他发现损坏和丢失了不少工具，有的同志把这些现象说成是“难免”的，“不足为奇”。他联系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觉得这里有阶级斗争。老吴和同志们商量后，建议党组织引导大家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展开讨论，认识到在丢失工具的背后，既有阶级敌人的捣乱，资产阶级的进攻，也反映出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沾染了“资产”风，从而使大家引起警惕，提高觉悟。从此，老吴的继续革命劲头也更大了。就是星期天，他也很少休息。最近我们访问他，刚巧是个星期天，这天上午，他学了两个小时《国家与革命》，接着帮助食堂清阴沟，搞卫生，到仓库检查工具，脏的洗干净，破的修理好，这些干完了，就去渣油路工地劳动，一直干到吃晚饭。晚上，他又和同房间的青年工人一起学习，谈心。

现在，在东阳全县，吴发琴的先进事迹正被越来越多的工人、贫下中农和广大群众传颂着。可是，他对自己却从不满足。最近，他在总结学习体会时说：“琴弦要拉紧才响，干革命要把自己管得紧一点才行啊！”

东阳县委报道组

（原载1975年5月16日《浙江日报》）

## 做清除旧社会痕迹的战士

——记清洁工黄裕琼、汪桃珍同志的先进事迹

一月的一天，晴空万里。在一架从南宁开往北京的飞机上，坐着广西壮族自治区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这当中，有一位来自合浦县廉州镇环境卫生管理站的清洁工人黄裕琼。他透过机窗，俯瞰着社会主义祖国的锦绣河山，心情无比激动。他想：在旧社会，我们清洁工人被地主资产阶级看作“脚底泥”。在新中国，清洁工人当上了人民代表，到首都同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这光荣，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这幸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才有的。

—

黄裕琼和他的爱人汪桃珍到合浦县廉州镇环卫站当清洁工已经十年。黄裕琼当过教师、干部；汪桃珍是个工人工程师的女儿，跟黄裕琼在同一个单位做过医务工作。一九六二年，他俩响应党中央关于“大办农业”的号召，从云贵高原回到北部湾畔的广西合浦县廉州镇。按照当地党组织的安排，汪桃珍在街道卫生所工作，黄裕琼到生产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根据工作的需要，他俩相继到环境卫生管理站当了清洁工。

“党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我们可得努力干呀！”

“清洁工的工作虽然又脏又臭，但它同样是革命工作，我们要干好。”黄裕琼到环卫站那天，就和汪桃珍这样互相勉励。第二天，他就拉着粪车，跟老工人一起穿街过巷，洗厕所、掏大粪了。

正当黄裕琼、汪桃珍积极工作的时候，社会上一些冷言冷语向他俩袭来：“千行万行都不去干，肯做掏粪工，定是犯了错误的”，“有知有识却去扫垃圾！”

听着冷言冷语，看着胸前的清洁围身，想着过去在国家机关当干部的情景，黄裕琼的思想也不禁翻腾起来：难道有了文化去做清洁工，就定是犯了错误的吗？难道掏粪、扫街就低人一等吗？

就在这个时候，镇党委书记来到环卫站蹲点，和工人们同吃，同住，同掏粪、扫街。在“三同”过程中，他看到这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十分尖锐，便及时同工人们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并且指出：地主资产阶级虽然被打倒了，但是他们那种鄙视工农、轻视劳动的反动思想还在毒害人们，瓦解人民的革命斗志。我们必须同这种剥削阶级思想作坚决的、不懈的斗争，安心做好清洁工作。听了党委书记这些话，黄裕琼和汪桃珍心里豁亮起来。

一天晚上，老工人方奕初上门找黄裕琼、汪桃珍谈心来了。老方讲述了解放前廉州镇“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景。他说：“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地主资产阶级，只顾敲骨吸髓，不管劳动人民的死活，有一年廉州镇死于霍乱病的就有两千多人。”他接着说：“今天，我们干掏粪工作也是为了革命，干得好不好，关系到镇上几万人的生活、工作、学习和健

康。革命先烈为了争取劳动人民的解放，死都不怕，难道我们还怕别人的嘲笑和白眼吗？！”黄裕琼、汪桃珍听了老方的话，不禁眼睛湿润了。汪桃珍曾经多次给黄裕琼诉说过自己的苦难家史：解放前，她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父亲九个兄弟姊妹，有一年瘟疫流行，就死去七个……今天，为了人民的健康，我们应当怎样对待清洁工这个岗位呢？

深夜，黄裕琼、汪桃珍又一次学习毛主席光辉著作《为人民服务》、《青年运动的方向》。毛主席的教导，党委书记和老工人的教育、帮助，使他俩深刻地认识到：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社会上那种冷言冷语，其实是地主资产阶级等级观念的反映。黄裕琼激动地对桃珍说：“我们干清洁工作，走的正是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的革命行动，是落实毛主席关于‘预防为主’方针的重要工作。”“对！我们一定要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用实际行动把那些肮脏的旧思想、旧观念跟垃圾、污泥浊水一起清除掉。”从此，他俩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干得更欢了。

## 二

黄裕琼担任清粪组长。他除了抓好全组工作，还分管八座最大最远的厕所。风里来、雨里去，天天去掏粪。粪池不掏干，他不罢休。组里工人病了，他不声不响地主动去顶班。而他自己，一次在拉粪车过窄巷时，右手被砖墙擦得鲜血直流，他撕下衣袖一裹，照样干。还有一次，他被车把撞伤了胸膛，呼吸也感到疼痛，他用药酒擦了擦，继续上班。

一天，黄裕琼正要到县招待所掏粪，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黄裕琼心想：县招待所的粪池低洼，如果不及时把粪掏干，就会溢出地面，影响环境卫生。他急忙披上雨布，戴上竹笠，拉起粪车，向暴风雨冲去。他顶着风雨拉了四车。一位女清洁工看到他已全身湿透，劝他道：“看你淋成这个样子，雨过再干吧！”黄裕琼认真地说：“不行呀，清洁工的职责，就是保持环境卫生，不掏完粪我心不安。”说着，就冲进雨幕中。当他拉着最后一车粪离开招待所时，一些工农兵旅客送给他一句话：“这个掏粪工，够格！”

黄裕琼懂得绘图。领导让他和六个工人组成工具改革小组，自力更生试制三轮扫街车。为了尽快绘好图，他每晚都干到深夜。扫街车的图纸绘出后，他又和小组的同志一起，边学边干，利用废旧材料，把扫街车制成了。用这种扫街车扫街，大大提高了工效，减轻了劳动强度。大家继续实践，又改革成功了载粪车、洒水车等一批保洁工具，进一步解放了劳动力，把清洁工作越做越好。

担任卫生消毒组长的汪桃珍，和四名消毒员负责全镇厕所、猪栏的消毒防疫工作。北部湾畔的盛夏，天气特别闷热。汪桃珍天天背着三十多斤重的木制手摇喷雾器，走东家，串西家，汗湿的衣服从早到晚没有干过。有时，消毒用的敌敌畏熏得她头晕脑胀，两眼发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她照样坚持干。她说：夏天是蚊蝇、病菌繁殖的季节，也是我们消毒员加紧战斗的时候。她喷药到哪里，就在哪里宣传“预防为主”的道理，宣传大搞爱国卫生运动的意义。

### 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黄裕琼和汪桃珍联系社会上那种鄙视工农、轻视劳动的现象，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论述和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他们认识到要是不深入批林批孔，不批判那些旧思想，“预防为主”的方针就不能落实，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就要受到损害。为了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黄裕琼、汪桃珍先后写了《同旧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扎根环卫站，做好清洁工》等发言稿和批判文章共计八万多字，在大会、小会作了上百次批判发言，向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向那些旧思想、旧习惯、旧传统观念猛烈开火。

黄裕琼、汪桃珍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带头批林批孔，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使环卫站的干部、群众深受教育，在社会上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原来不安心当清洁工的青年工人安心下来，积极工作了。有许多老工人支持自己的子女来当清洁工。过去有些学生看到清洁工人拉粪，就捂着鼻子绕道走，如今，他们看见清洁工人拉粪车上坡，主动帮助推车。合浦县委领导同志和一万多名机关干部、职工和学校革命师生，先后来到环卫站和工人一起掏粪，扫街，洗厕所，用实际行动去荡涤孔孟之道的流毒，实践“预防为主”的方针，使廉州这座有两千一百多年历史的古城的面貌变得年轻了，也更加清新了。不久前，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关部门在廉州镇召开了全自治区卫生工作会议。

\*

\*

\*

黄裕琼参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北京回来以后，在环卫站党支部领导下，和同志们一起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通过学习，黄裕琼和汪桃珍进一步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它还带着旧社会的痕迹，还存在着三大差别；鄙视工农、轻视劳动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还继续散发臭气毒害着人们。黄裕琼说：“对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在政治上我们要继续批臭它，在行动上我们要坚决抵制它。我们要自觉改造世界观，做消除旧社会痕迹的战士，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

《光明日报》通讯员

（原载1975年4月26日《光明日报》）

## 勇当破除旧观念的尖兵

——记复员军人魏尧升退伍不回上海、立志务农的事迹

当前，一个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正在全国蓬勃兴起。广大军民刻苦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认真地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怎样在实践中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促进派？怎样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共产党员、人民解放军济南部队装甲兵某部炮团上海籍战士魏尧升，在临别部队的时候，响亮地提出：“退伍后不回上海，立志去农村干一辈子革命，以实际行动为缩小三大差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魏尧升这种敢于向资产阶级法权挑战的革命精神，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坚强决心。

### 当兵六年整，务农志不变

魏尧升是一九六九年三月在上海海防中学入伍的。六年前，当他还在学校的时候，为了落实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小魏联合了十多位同学，向党组织表达了去黑龙江农村干革命的决心。当时他想的是：知识青年只有和工农相结合，才能有所作为；只有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才是有出息。

不久，小魏应征入伍了。在部队六年里，他几乎每年都有一段时间在农村锻炼。在那里，小魏看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看到贫下中农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看到广大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这一切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对农村和贫下中农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今年一月，传来了四届人大胜利召开的喜讯，小魏认真学习了大会文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想到，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上不去，社会主义建设就会受影响，四届人大提出的宏伟目标就难以实现。既然农村入伍的同志复员要回农村去，城市的知识青年也踊跃上山下乡，那么我们在城市入伍的复员军人，为什么不能自觉想到整个革命事业，到农村去干一辈子革命呢？

那些日子，也正是部队开展复员教育的前夕。个别老战士在议论今后去向和前途问题时，流露出“农村不如城市好，种田不如做工强”的错误思想。这引起了小魏的深思：重工轻农是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反映。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敢于以实际行动来批判这种错误倾向，勇当破除旧观念的尖兵。他下定决心：今年一旦批准退伍，就坚决实现六年前立志务农的志愿。

革命的志向激励着他，火热的战斗召唤着他。在一次部队领导机关召开的老战士座谈会上，魏尧升以十分激动的心情表达了自己的心愿。

但是，这时小魏思想上也有斗争。他想，复员到农村干一阵子，还是可以做到的。可是，要一辈子扎根农村，可不简单哪！那两天，小魏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我们要保持

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的教导，想到了许多解甲归田的老红军战士：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里，浴血奋战，不怕牺牲；胜利了，他们不居功，不贪逸，继续为革命吃大苦、耐大劳。毛主席的教导，革命老前辈的崇高品质，深深地激励着魏尧升。他懂得了，共产党员的一辈子，应该是革命的一辈子，艰苦奋斗的一辈子。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战士，应该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在革命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

怀着这样的心情，二月二十二日上午，魏尧升郑重地向党委提交了《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立志务农干革命》的决心书，并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王杰同志牺牲时所在的公社去，到老革命根据地去！

### 革命的道路，坚决走到底

“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应当打破个人的小圈圈，想到整个革命事业，豪情满怀地选择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农村去干革命，为改变农村面貌，缩小三大差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部队领导看着这份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决心书，深受感动。党委马上开会，认真地讨论了这份决心书，一致表示：坚决支持小魏的革命行动。

这时，正好《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部分论述。小魏经过反复学习，又多明白了一层革命道理，心里更亮堂了，立志务农的决心更坚定了。

那天晚上，和他同年入伍的聂忠树找他谈心，问道：

“你的主意定了？”

小魏坚定地说：“定了，退伍后到农村去。”

小聂点点头，又说：“你去农村，我支持。但下去还有各种阻力哪。”

小魏满怀信心地回答：“阻力，肯定会有。但是，有党的教导记心头，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航向，任何阻力都能冲破。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我要与旧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我要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去做好家庭的思想工作；到了农村后，也要坚决同社会上的旧思想、旧意识作斗争。”

隔了一天，排长也来找小魏。这时，小魏正在学习《红旗》杂志的文章，一见排长，就说：“我复员后决定去农村，正想听听你的意见。”

排长笑了笑，回答：“这事，还得看你自己。”

“排长，论条件，农村比起城市来，差别确实很大。但是，一个革命战士应该拿出实际行动，努力缩小这一差距。上山下乡这条革命道路，我坚决走到底！”

小魏沉思片刻，继续说：“这两天，我想到过革命战争中的英雄，他们舍生堵枪眼，炸碉堡，是为了祖国的解放。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同样有许多象雷锋、王杰、杨水才这样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们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生命。现在，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也有一个一个反映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碉堡’，我们难道因为怕困难，怕艰苦，就不去攻克它们吗？”

魏尧升的一席话使排长十分感动。这几年来，他总觉得自己是了解小魏的，其实并不如此呀！他紧紧地握住小魏的手说：“你讲得很对，你的心意我明白了。”

魏尧升立志务农的消息传开后，战友们纷纷前来向他祝贺。每当这时，他总是说：“让我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缩小三大差别而共同战斗。”

同志们听着魏尧升的话，看到了魏尧升那颗火热的心。是啊，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应该有魏尧升那样的胸怀，想党所想，急党所急，时时刻刻地为党的事业着想。

### 耐心做工作，教育一家人

在家里，魏尧升是年老体弱的妈妈最疼爱的孩子。六年来，每当母亲接到小魏的来信，心里就特别高兴；这两年也盼望着孩子能早日回到自己的身边。如今，小魏决定复员后不回上海而去农村，妈妈会有什么想法呢？小魏想：我一定要宣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宣传向资产阶级法权挑战，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意义，让一家人都支持自己的革命行动。

部队的领导为了既积极又慎重地处理这一工作，派出两名干部同魏尧升一起回上海。

那时，小魏的母亲因病正在住院。病房里，妈妈见到即将复员的孩子，高兴得紧紧拉着小魏的双手。

“妈妈，这几年来家里对我在部队服役支持很大啊。”

妈妈想起小魏在部队头两年内就通读了《毛泽东选集》，近几年又读了许多马列著作，在部队入了团，入了党，立了三等功，打从心眼里高兴，笑着说：“对！你在部队是争气的，我真为你高兴！”

“下一步我还要去艰苦的地方呐！”

顿时，母亲的脸色沉了下来。她默默地听着小魏语重心

长的话：“妈妈，你不是常对我们说要争气吗？可争气不是为了一家子，而是要为党的利益着想，去为革命争气，为毛主席争光啊！”这天，小魏没能把自己下乡务农的志愿直说出来。

第二天傍晚，在病房的床头边，小魏又和妈妈谈开了。这次，他要求妈妈再讲一遍旧社会苦难的家史。旧社会，妈妈是个从小就丧失父母的孤儿。她十一岁就在丝厂当童工，后来又为资本家打短工、当佣人，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和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妈妈讲到旧社会的苦，就激动得说不下去了。

小魏抓住时机，接过话头说：“解放了，我们的日子不是越过越好了吗？可我们不能忘记过去，要为党多做贡献。”接着，他说出了自己复员不回上海、立志务农的决心。

这时，母亲为难地不知说啥好。小魏向妈妈讲了新社会保江山、防复辟的重要性，讲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他说：“对资产阶级法权不加以限制，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搞资本主义复辟就有社会基础。我去农村，就是以实际行动破除旧的传统观念，为缩小三大差别贡献青春。”

接连三天，小魏在病床旁反复向妈妈宣传复员去农村的意义。母亲领悟到孩子走的是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党把他教育培养成人，做父母的应该鼓励孩子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终于愉快地同意让尧升去农村干革命。她对尧升说：

“我想通了，你到哪里去我都没有意见，把你交给党组织，交给贫下中农，我一千个放心，一万个放心。我们每个人都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年轻人是需要到农村广阔的天

地里去闯的！”

“你从上海参军，复员回上海工作，哪里来回那里去，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小魏的回答是：“现在我们的国家正遵循党的基本路线，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前进进行着伟大的斗争，我们应该多想想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是不是与革命形势相适应。作为共产党员，党需要我到哪里，我就到那里去！”

“你到农村去，家庭有困难怎么办？”

小魏的回答是：“家庭的困难，只是在一家范围内，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迅速改变农村面貌，则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千百万家庭是否会重新回到旧社会，吃二遍苦的大问题。”

“农村艰苦的生活能习惯吗？”

小魏的回答是：“革命事业是在艰苦岁月中开创的，青年要在艰苦环境中锻炼成长。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就是要和贫下中农一道艰苦奋斗，以苦为荣，以苦为乐。”

“在农村无亲无戚，你能扎下根吗？”

小魏的回答是：“上山下乡是毛主席为知识青年指明的一条康庄大道，广大贫下中农会欢迎我，困难和阻力动摇不了我。只要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我就能在农村站住脚，扎下根。”

“你一定要去农村的话，那也不要离家太远！”

小魏的回答是：“贪近还没有摆脱小家庭的束缚，我要学习英雄人物，无产者干革命四海为家！”

……。



奋，无比激动。在即将离开上海奔赴农村的时刻，他把部队首长、战友赠送的装有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书箱，和镰刀、铁锹、铁镐等新农具，整了又整，摸了又摸，决心发扬革命光荣传统，在毛主席亲手创建的第一块红色根据地，扎根一辈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奋斗一辈子。

《解放日报》通讯员 《解放日报》记者

（原载1975年3月31日《解放日报》）

（注：据《人民日报》一九七五年五月八日报道，魏尧升同志已到井冈山革命老根据地的三湾大队安家落户，和贫下中农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 一 桩 婚 事 的 报 告

——记优秀共青团员丁玉芹同特等残废军人  
陈忠江结婚的故事

河北省东光县秦三村大队的优秀共青团员丁玉芹，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大破剥削阶级的腐朽婚姻观，于一九七四年年初，同本村特等残废军人陈忠江结婚了。

怎样正确对待婚姻问题？怎样正确对待理想和前途？这是每个青年人都要遇到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阶级、不同的世界观，有截然不同的回答。在这个问题上，二十五岁的年轻姑娘丁玉芹，用自己的革命行动，做了很好的回答。

## （一）

一九七〇年十月，丁玉芹同本村现役军人陈忠江订婚了。

忠江和玉芹都是贫农的好后代。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忠江和玉芹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是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冲锋陷阵的战士；在生产斗争中，是大干社会主义，改变农村面貌的生产能手。一九六九年春天，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侵犯我国神圣领土珍宝岛时，忠江满腔怒火，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铁道兵。就在玉芹和忠江订婚不久，担任了汽车司机班副班长的忠江在完成修建成昆铁路的任务以后，又开赴修建另一条钢铁大道的新工地。

玉芹听到忠江响应党的号召开赴新战场的消息，心情十分激动。她学着母亲在战争年代里做军鞋支援子弟兵在前方打胜仗的样子，收工回来，又坐在灯前，飞针走线，一连熬了几个夜晚，为忠江赶做了一双结结实实的纳帮鞋。鞋寄走了，可是久久不见回信。三、四个月过去了。突然，忠江从部队捎来一个口信，说是他因公负伤了，伤势很重，要玉芹另找对象，别再等他了。

原来，一次忠江在人迹罕到的山谷里运送架设桥涵的水泥，因抢救战友而身负重伤。

玉芹怀着沉重的心情，给忠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为革命负伤是光荣的。相信有党和部队领导和同志们的关怀，你的伤一定能够治好。请你安心休养，等候你的好消息。”

这封信发出不久，玉芹很快就接到了一封回信。忠江在信上恳切地说：“玉芹同志，你知道我负了重伤，特意写信安慰我，这种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使我很受感动，值得我学习。但是，你还不了解我的伤情，我应该如实地告诉你。我的伤势很重，由于腰椎骨神经创伤，我的下肢已经瘫痪，生活不能自理。为了不耽误你的理想和前途，我劝你还是另找对象吧！至于我今后的生活，党和政府一定会妥善安排，请你放心。”

看完这封信，玉芹的心象是被揪去了半拉子。她的确没有想到忠江的伤势会这样严重。可是，这个倔强的姑娘，很

快就平静下来，她再次写信鼓励远方的亲人：

“忠江，我为你的伤势感到难过，但我更为你那种‘毫无私自利之心的精神’所感动。你为革命负那么重的伤，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他人，我为有这样的阶级兄弟感到骄傲。你为革命负伤，我绝对不能为个人主义的目的而离开你。希望你好好养伤，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 （二）

玉芹两次给忠江写信的消息一传开，人们纷纷议论。有人赞扬，也有人反对。

多数贫下中农称赞地说：“忠江是个好青年，他是为革命负的伤，玉芹做得对。”

可也有人说：“这么个好闺女，咋能和一个瘫子过一辈子，趁早另找对象。”

有的认为这门亲事散定了，找上门来给玉芹介绍对象。还说什么这个对象可以使你享一辈子福。

玉芹暗暗警告自己：被打倒的阶级敌人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正在用各种旧思想、旧意识腐蚀人们的思想，同无产阶级争夺我们青年一代。难道我们青年妇女找对象就是为了物质享受？千万要警惕，绝不能当资产阶级的俘虏啊！

玉芹的高尚思想得到了母亲的坚决支持。

母亲把一家人召集到一起，讲述过去苦难的家史：

在那万恶的旧社会，丁玉芹一家生活非常贫困。那时候，穷人那能娶得起媳妇啊！玉芹的父亲到三十五岁，才在一个阶级兄弟的帮助下和母亲结了婚。“七·七”事变后，

日本鬼子窜到秦三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有一次在附近一个村活埋了四十八个阶级兄弟。叔叔恨透了日本鬼子，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父亲积极参加抗日斗争，时常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掩护八路军的交通员和侦察员。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以前，叔叔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如今，忠江是为了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光荣负伤。我们怀念叔叔，更应爱戴忠江。要记住，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军队解放了咱们的家乡，咱们才过上今天的幸福生活。解放军跟咱是一家亲啊！

玉芹决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击那些风言风语。

忠江从小就死去了母亲，家里有七十多岁的老父亲。玉芹主动登门帮助公爹料理家务，作些缝缝洗洗的活儿。老公爹很受感动，他逢人就说：“新社会真是新人新事多呵！前年，听说忠江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为了抢救战友受了重伤，我感到光荣，感到自豪。不过我也担心玉芹和忠江的婚事，会不会受影响。如今，看着玉芹实心实意地照顾俺，俺才一块石头落了地。这都是毛主席教导的好啊！”

### （三）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一九七四年的初春时节，在批林批孔运动蓬勃展开的时候，玉芹来到忠江所在的革命军人疗养院，找忠江结婚来了。

丁玉芹的到来，使整个疗养院沸腾了。疗养院的领导、医生和护士都纷纷赶来祝贺。忠江的战友们也纷纷围上来，向她致敬。疗养院里上上下下，高高兴兴，大家都为忠江和玉芹筹办喜事而忙碌。

就在这一年的麦熟时节，玉芹为了减轻国家负担，从疗养院把忠江接了回来，亲自护理。领导上十分关怀忠江，还给他特制了一个手摇三轮车。玉芹推着忠江，看看村里几年来的巨大变化，看看人民公社丰收的景象。

小车走在田间、村头，许多社员围上来探望，关切地问长问短。也有人认为玉芹真“傻”，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请求领导给自己找个工作？为什么不同别的闺女比一比？

“同别的闺女比什么？”就这个问题，团支部召集全村青年开会，丁玉芹作了公开回答：

“比什么？比排场，比吃穿，比享受吗？咱不干。我就是要同忠江一起，和青年伙伴们比学习，比劳动，比思想，比一比对革命的贡献！”

“我和忠江为什么要回到农村？留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是我俩的共同志愿。家乡不富裕怕什么，正因为不富裕，才需要我们留下来战斗，为改变农村面貌，缩小三大差别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在党支部的支持和鼓励下，丁玉芹和陈忠江双双登上讲台，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复辟、倒退、卖国的孔孟之道，针锋相对地同阶级敌人宣战：

“历史上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地掩盖婚姻问题的阶级性，宣扬什么‘贞节烈女’，鼓吹‘婚姻是命中注定’。反动阶级的代言人林彪、孔老二之流，就是用‘天命论’来欺骗劳动人民，好让我们服服帖帖当奴隶，听凭他们搞‘克己复礼’。我们革命青年，不信天命干革命。想想看，在旧社会剥削阶级过的是那种夫贵妻荣的寄生生活，而

我们贫下中农却是过着忍饥挨饿、卖儿卖女的悲惨生活。所以，我们革命青年的婚姻问题，是同革命紧紧连在一起的，婚姻问题，要服从于革命，有利于革命。”

丁玉芹的批判发言，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贫下中农称赞丁玉芹在阶级斗争中立场坚定，打了一个大胜仗。一个学习丁玉芹同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活动在秦三村迅速展开了。

#### (四)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在全村社员群众的亲切帮助下，如今，这对年轻夫妇生活得很美好。月初，粮店的职工把供应忠江的粮、油送上门来；生产队分了粮食、蔬菜和柴禾，社员们也都抢着先给她家送去。玉芹婚后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带动全队妇女积极投入了冬季农田基本建设，不怕苦，不怕累，拚命大干社会主义。她每天很早就起床，把家务事料理停当，叫上左邻右舍的女社员下地干活。秦村中学聘请陈忠江做校外辅导员，天真活泼的“红领巾”们，时常来他家帮助担水、扫院子，有时听他讲工人和解放军叔叔艰苦奋斗，修建成昆等铁路的故事。忠江主动同玉芹分担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每当玉芹劳动归来，忠江已经烧开了一锅水。玉芹把猪食桶提到猪圈旁，忠江坐上手摇车，一勺一勺地喂猪。夜晚，在明亮的灯光下，夫妻俩一起学政治，学文化，写批判稿。两个人都参加了大队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小组，一起参加了大队、公社和县里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夫妻并肩向着反动的孔孟之道和封资修的陈腐婚姻观猛烈开火，杀向阶级斗争的战场。经过火热的阶级斗争的锻

炼，丁玉芹于一九七四年九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担任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一年来，丁玉芹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在三大革命运动和广大社员群众一起，大干社会主义，决心彻底改变秦三村的面貌，为社会主义祖国作出新贡献。

《光明日报》通讯员

（原载1975年3月27日《光明日报》）